

人，

岁月，

生活

第六部

伊里亚·爱伦堡著

# 人,岁月,生活

第 六 部

爱 伦 堡 著

冯 南 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人,岁月,生活(第六部)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0,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1}{4}$

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

书号 10019·2932 定价 1.40 元

我以一九四五年五月作为本书第五部的结尾，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因为我将在最后一部里叙述的一切开始于一年之后。

而一九四五年的事件和感受仍与战争紧密相联。在波茨坦会议上，在于伦敦和莫斯科举行的外交部长们的会晤中，我国的外交官们同盎格鲁撒克逊人争论，但结果仍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热情洋溢的电报和勋章的交换仍在继续。对希特勒分子及其同谋者的审讯正在各地进行；检查官们看到自己最忙碌的时刻来到了。赖伐尔和吉斯林<sup>①</sup>被审讯和处决了。对贝尔森的刽子手们的审判延续了很久。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波兰和我国，不论哪一天都要刊登控诉书。审判了老态龙钟的贝当，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法兰西的毁灭中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就连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我年轻时曾读得入迷的几部出色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也被审讯

---

<sup>①</sup> 吉斯林(1887—1945)，挪威法西斯头子。

了，尽管他已八十五岁，并且多半是出于老年的糊涂才赞扬希特勒的。

惊恐万状的佛朗哥还在东奔西跑。日本还在抵抗。我还记得我读了关于原子弹的消息的那一天。即使我们经历过的灾难也不能根本消除一切人类的情感，不料却发生了一桩使我们离开有关良心和精神进步的习以为常的概念无限遥远的事件。而我却依旧相信曾被一个四年级的中学生摘录下来的柯罗连科的话：“人为幸福而生，正象鸟为飞翔而生。”想不出有比广岛更为震耳的对十九世纪的反驳了。

已经超过服兵役年龄的人们不知何故立刻感到疲倦万分；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支持住了，一旦松弛下来——许多人却卧病不起了：血管梗塞，高血压，中风；黑框的悼文不时可见。

七月里，满载复员军人的第一批列车向东驶去。士兵们回到了被炸弹摧毁的城市和烧毁了乡村。他们想休息，而生活却不允许。我重又看见了我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生活艰难，许多人食不果腹，干力不胜任的工作，但依然没有气馁。

在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室里，从伏尔加河一直走到易北河的三十多岁的老战士们，同年纪轻轻的后生们并排而坐。其中的一个对我说：“不得不在半夜里死啃书本——忘啦，忘得一干二净！可我是上过学、拿到过文凭的

……”我看着他，心里想：当然，困难，比他自己所感到的还要困难——因为他要第二次取得文凭，要度过第二个学生时代……我们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的过去，而又竭力想着未来，推测着，幻想着——既默默自语，也大声说出让别人听见。

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悲剧；这个说他丧失了技能，另一个埋怨不给他住处。一个年轻的中尉忧郁地一再地说：“原来他也叫别佳，就象是故意……”他回到故乡穆洛姆，看见妻子有个新丈夫，她为了不使他伤心就不写信，而这位新丈夫竟又是一个同名的人！中尉险些儿把他们两个给宰了，后来他们坐下来吃晚饭，把他送到车站。他决定到塔林去——他是在那里复员的，而半路上却来找我“倾吐积愤”了。

一位教授曾向我谈到那些长了小胡子的阴沉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根本不再听话了……”我暗自冷笑了一下：要知道我也不再听话了。我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但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才坐下来写作《暴风雨》——我很久都不能站在一旁观看战争。起初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出了什么事；后来我仔细观察别人，这才明白要摆脱战争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都中了它的毒。

早先我曾幻想：战争结束后，我要休息休息，在森林里、草原上走走，然后坐下来写长篇小说。原来我是不能

呆在一个地方不动的。我开始了漫游。

六月底，我到了列宁格勒，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我就没有去过那里。（我每次来到这个城市，它都使我震惊；在离开莫斯科——我爱莫斯科，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后两眼得到了休息：列宁格勒的街道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天与水都被囊括在城市的景色之内。）到处都可以看到恐怖岁月的遗迹，没有一所房屋不是残缺不全或伤痕斑斑的。有的地方还遗留着一些警告人们不要沿着街道的某侧行走以避免危险的字句。许多房屋都在树林里；干活的主要是妇女。人们开玩笑地谈论着“整容术”。然而使人伤心的不是房屋，而是人。我曾仔细观察人群：列宁格勒原来的居民多么少啊！多数是来自其他城镇和乡村的人们。经历过封锁的人们，一连几个钟头叙述着封锁的惨状；他们所说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每一次都使人喉咙发紧。

七月九日发生了日蚀。人们站在街上观看。突然天昏地暗，寒风阵阵，群鸟乱飞。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子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不值一提！当德国人从乌鸦山上开炮的时候……”

旧书店里躺着一堆堆的罕本书——因营养不良而死去的列宁格勒市民的藏书。我拿了一本。售货员说：“恭喜。”可我却连高兴一下也不能。这是一本布洛克的诗选，上面有写给一个我不知道的女人的题辞。我直到现

在也不知道，这是偶然留下的墨迹呢，抑或是布洛克生活的一页；我不知道，战前这本书是在谁的手中——是诗人所熟识的那个年老的女人，是她的子女，或者是一个藏书家。这也许是一种盲目崇拜，但是瞥了一眼布洛克的笔迹，我却回忆起了很久以前的彼得格勒、死者的阴影、一代人的历史。

我看见一张广告：“役犬和在封锁中幸免于难之犬展览”。在荣耀的座位上坐着被削去一只耳朵的牧羊犬吉那；一行题字说明它曾发现了五千枚地雷。狗儿忧伤地瞧着来客，大概是不明白人们何以要看它，——须知它做的只不过是人们所做的事儿，而且遭受的损失也很轻——只有一只耳朵。经历过封锁的狗仿佛有十五只——都是又小又瘦的非良种狗；牵着它们的女主人也是一些又小又瘦的老太婆，她们曾同自己心爱的狗儿分享一份不够吃的口粮。

（一位作家曾写信给我，说我在本书中写狗写得太多，这是“老爷们的怪癖”。在读他的信时，我不仅想起了卡什坦卡，也想起了列宁格勒的老太婆们。我再说一遍：我的书是对一个人——许多人之中的一个人的生活所作的极其富于个人色彩的叙述；人们有同样的权利可以指责我，说我对绘画写得太多，而对音乐则写得少了；我往往想到巴黎而没提芝加哥，说了犹太人而没谈冰岛人。）

我在展览会上想起了两只列宁格勒的狮子狗——乌



尔斯和库斯的故事；它们属于高尔基传的作者、“谢拉皮翁兄弟”之一的伊·亚·格鲁兹节夫。在封锁开始的时候，格鲁兹节夫的妻子拿来了面包——两天的口粮。穿堂里的电话响了；她忘掉了饥饿的狗儿，后来想了起来，赶紧跑回室内。狮子狗儿瞧着面包，口涎直滴：看来它们比许多人都更有自制力。伊里亚·亚历山大洛维奇在这之后不久便枪杀了乌尔斯，拿它的肉来喂库斯，库斯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变得多疑而忧郁了。我无意把我的爱好强加于任何人。可以不喜爱狗儿，但对于某些狗的故事却值得思索一番。

我曾在普希金诺的一所被破坏了的宫殿的四壁看到一些西班牙字句——“蓝色师团”的雇佣兵曾在此寻欢作乐。他们大概以为很快就将通过列宁格勒的街道……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想着战争。安娜·阿赫玛托娃曾这样描写皇村花园里的普希金：

这里曾躺着他的三角制帽  
和一卷破烂的帕尔尼<sup>①</sup>的诗集……

在地下找到了普希金的雕像——它被埋藏起来了；三角制帽也在旁边被找到了。和平女神的雕像被推倒在地。印诺肯奇·安年斯基曾描写过它，我也常常反复吟

---

<sup>①</sup>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

诵这些诗句：

啊，请把永恒给我，——我又将献出永恒  
换取对屈辱和岁月的淡漠。

不，这种交换不能进行，这不仅因为我们并无永恒，  
而且还因为无论岁月或屈辱都是不可忘怀的。

彼得高府<sup>①</sup>的宫殿被破坏了；人们说：“我们要修好它。”我明白，将会有有一个仿制品，一幢新的建筑物。德国人砍伐了三千株古树。

该城的保卫者——列宁格勒近卫军于七月八日入城。我站在基洛夫工厂旁边。老工人们举杯款待战士。妇女们拿来了开放在郊区的荒地上的野花。一切都异常朴实而动人。

傍晚，列·亚·戈沃罗夫邀我去别墅。在美妙的白夜里我们在凉台上回忆战时的岁月。后来列昂尼德·亚历山大洛维奇谈起列宁格勒的美，并突然朗诵起来：

它蕴藏着多么大的力量！  
这匹马性同烈火一样！  
你往何处飞奔，高傲的马啊，  
你要把铁蹄落在何方？

---

① 彼得宫城的旧称。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人民变聪明了，这是无疑的……”

有一次我们同一群作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贝利亚被授予了元帅称号。奥·费·别尔戈利茨突然问我：“您是怎么想的，三七年是否会重演，也许现在这不会吧？”我答：“不，我看不会……”奥尔加·费奥朵洛芙娜大笑起来：“可您的声音却是没有把握的……”

曾有一位姑娘前来找我，她说：“您大概将要描写战争。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封锁时期，当时我在工作，还写日记。请您读读，也许对您有用。用毕请还给我——这对我是个纪念……”夜里，我开始阅读这个小本子。记载都很简短：多少克的面包啦，多少度的严寒啦，瓦西利耶夫死啦，娜嘉死啦，姐姐死啦……后来我的注意力被以下的记述吸引住了：“昨天读了一整夜《安娜·卡列尼娜》”，“通宵看《包法利夫人》……”姑娘来取自己的日记时，我问道：“您怎么竟能在夜里读书呢？没有灯哪。”“当然，没有灯。我每天夜里回忆我在战前读过的那些书。这曾帮助我同死亡斗争……”我很少听到给我的影响有比这更为强烈的话，在国外，每当我竭力想说明是什么帮助我们坚持下来的时候，我曾多次引用这一段话。在这段话里不仅有对于艺术的力量承认——其中也有对我国社会性格的证明。尤里·奥列沙写过剧本；女主人公编制了两份统计表：一份拿来登记她称之为革命的“罪行”的

事件，另一份登记革命的“善行”。关于第一份统计表，人们近几来说得不少，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罪行算在革命的账上，罪行是由于违反了革命的原则才得以实现的。至于“善行”，则它们的确是同革命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剧里的女主人公说道：革命把书籍和地球仪送到了牧人的手里。记日记的姑娘于一九一八年生于沃洛格达省的一个偏僻的农村，曾在师范学院学习，战争开始时当了卫生员。同苏维埃社会的本质相联系的，不仅只是她能在封锁时期可怕的夜里回忆早先读过的那些最优秀的书籍，而且还有她对我的惊讶感到奇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后在最艰难的时刻都一直支持着我。

我曾去找丽莎·波隆斯卡雅。她叙述了她撤退时在卡马河上的生活情况。她的儿子在军队里。我们谈论着战争、奥斯威辛、法兰西、未来。我同她在一起感到轻松，仿佛我们曾一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突然我想起了动物园旁边那条巴黎的街道、海象夜里的叫声和诗歌课，于是不作声了。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见是痛苦的，特别是在心境不宁的当儿，在心软的时候试着取笑自己几句，柔情就同苦恼混在一起了。

我一回到莫斯科就立刻想走。举办过几次马雅可夫斯基晚会的巴·伊·拉乌特来了（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长诗里提到过他：“安静的犹太人巴威尔·伊里奇·拉

乌特曾对我说……”)。巴威尔·伊里奇建议举办晚会，问我想去哪里。我不知何故挑选了雅罗斯拉夫尔和科斯特罗马。轮船在平稳的运河里走了很久。人们谈论着一去不返的人们，比较各个城市里的集市，有的人饮酒、唱歌。我竭力要睡，但睡不着。

我喜欢科斯特罗马——巨大的广场、商场、烟草市场、伊帕杰夫修道院。我还受到了殷勤的接待。省委书记邀我午餐。(拉乌特深受感动。)年轻的诗人们聚会朗诵自己的诗作。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储存的展品。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间，有些青年画家的油画从莫斯科送到外省的博物馆去了，这些画使我想起了当时莫斯科的街道——立体主义者，构成主义者，至上主义者。一幅静物画吸引了我的注意。原来这是科罗文<sup>①</sup>的一幅画稿。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不能把它挂在大厅里呢。经理惊讶得举起两手一拍：“您是怎么啦！这是印象派的影响，背离了现实主义。”

晚会后，一位退休的大尉走到我跟前，自我介绍说：“您的读者。”他微跛地在长长的街道上一步步地走着：“例如这样的事实您就可以描写。譬如说，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次战争，开始是在里沃夫，做侦察工作，四次负伤，最后一次是在布达佩斯城下，谁都没说过我是胆小鬼。不

---

<sup>①</sup> 科罗文(1858—1908)，俄国画家。

料昨天他却把我叫到市苏维埃去。他嚷了起来。我知道他是有过错的，他曾亲口告诉我说没有柏油纸，这就是说，没啥可忙的，但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在你面前既是将军，也是元帅，又是上帝。总之，我成了胆小鬼。请您写明，为什么会这样。不过请您别提我的姓名——他会把我磨成粉的，请您最好连科斯特罗马也别写，只写人世的一桩趣事……”

在伊帕杰夫修道院里，我久久地站在一个旧炉灶前面；在两株树下的一块磁砖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即将死去，另一个正在诞生。”这年夏天，我写了几首诗，都是写树木的。我回忆青年时代：

我忐忑不安而又没有信心地活着，  
说的是不相干的废话，  
但我还记得一棵大树，  
墨色的枝叶衬以蔚蓝色的天空，  
我还记得我喜爱的一个女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力量不够，  
但我曾迷信而羞涩地  
抓住一只手但又把它松开。  
一切都早已消失，  
连屈辱也没有留下影踪，  
只有那一棵大树，

仍照旧挺立在某处。

我描写勇敢精神：

曾有一株青草，象奴隶一样趴在地上，  
一颗柔和的露珠闪闪发光，  
一只飞燕舍弃了屋顶，  
飞向温暖的天庭。  
大树啊，只有你  
还在坚守自己的岗位——  
你是一名受命掩护  
自己的高地的士兵……

我谈到自己的生活，谈到我写了什么和想写什么：

……我曾同它们一起生活，我听过它们的故事，  
可爱的栗树、橄榄和榆树啊。  
那不是风景画，不是背景，也不是装饰，  
树上有着命运和忠实。  
我将离去——它们会留下来警戒，  
我已开始讲话——它们会把话讲完。

我之所以写诗，想必是因为早年的激情还没有平息下来；这些诗曾刊登在《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上。但我重又长期同诗歌分手了。

我记不得在雅罗斯拉夫尔举行的晚会的情景了，但我在那儿看见了亚得维加。她象在考特贝尔那样温柔地微笑着。无话可说——我的青春在寻找我……

亚得维加在师范大学工作，女儿塔尼亚同她住在一起。塔尼亚有个未婚夫。我觉得，亚得维加的变化很小——声音和眼睛都是先前那个样子。女儿，未婚夫……我突然感到，人生有多么长啊。人们一天天地生活着，没有觉察岁月的流逝。老年的来临想必使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

我们在堤岸上漫步，观看古代的教堂。一个管仓库的女人在抱怨命运：子女和丈夫都杳无音讯，又不给她养老金。大学生们问道：“日本很快就会投降吗？”“的里亚斯特将属于谁——属于南斯拉夫或属于意大利？”“您对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抱什么态度？”“为什么没有一个作家写一部《战争与和平》？”旧货市场上出售糖块和卤获的女上衣。可亚得维加却在一旁走着，就象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以前在莫斯科那样。

回到莫斯科后，我立即到基辅去了。克列夏齐克没有了，但天竺葵却在石制的花瓶里开花，还有警察在指挥交通。我沿着大学街向高处走去——这里曾有一所我在其中诞生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堆垃圾。我在第聂伯河畔坐了很久，战争，拉宾的铃声，横渡第聂伯河的情景，汇聚成漫无止境的一天的岁月，这一切重又出现在我的眼



前。我想：我很快便将坐下来写书了——这就是说，战争将在我的房间、头脑和心灵中逗留很久。我去找过狄琴纳、巴然、戈洛瓦尼夫斯基、卡冈。我曾在波多拉河上一位军官那里坐了一个晚上，——他在街上叫住了我，说我们曾在明斯克附近相遇，便把我邀往他处，买了半升酒和一些香肠，接着久久地谈起了他的儿子们，说他们怎样长大、学习、参加战争，然而一去不回。“为什么被打死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呢？……妻子留在基辅。在娘子谷里……”我离开他的时候已经很迟，接着在崎岖不平的街道上徘徊了很久。天已亮了。我沉思了片刻，突然发觉，我正站在一株栗子树旁谈话——不知是在同树谈还是在同自己谈。过了几个钟头我才走开。

在莫斯科曾有一位陌生人前来找我，他说：“请原谅我冒昧前来——您的电话很难打通。我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科拉洛夫”……我们那儿没有电梯，因而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已年近七十，不知是怎么爬上来的？……但瓦西里·彼得洛维奇却微笑着，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说，他请求我去访问保加利亚，写写这个国家。“在西方也有人读您的作品……”我立刻同意了。

几天以后，格·费·亚历山大罗夫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前去找他。他态度十分亲切，夸奖我的文章。“我们支持保加利亚朋友的请求……”我忽然想问，为什么在四月份他不回答我的信，但我立刻明白这是不必要的——他